

高帆 著

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 理论与实证分析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in China

上海人民出版社

高帆 著

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 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in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高帆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4032-5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城乡经济联系-研究-
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2586 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封面装帧 张志全

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高 帆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271,000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32-5/D·2920

定价 58.00 元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
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项目编号：12CJL039）的结项成果

前 言

本书旨在研究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形成逻辑与完善思路,这种研究取向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均呈现出演变态势,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城乡结构转化以及城乡要素配置方式正处在亟待转折调整的“十字路口”。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转换的平滑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程度,而在商品市场化急速推进的背景下,二元结构转化的“瓶颈”又日益集中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在此意义上,提出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这一命题是中国促进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的逻辑必然,而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对中国经济具有效率提升和分配正义的双重价值。在理论层面,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阐述了劳动力流动对二元结构转化的关键作用,“城乡要素市场有效率”构成了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前置条件。然而,当前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阶段,“城乡要素市场在完善”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以及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背景,这与发展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并不一致。此外,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空间差异性和行政科层差异性也构成了理解其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要素交换关系问题的出发点。就此而言,深入探究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完善问题,在理论维度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本土化融合提供了重要契机。

基于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本书从三条线索出发梳理并评述了已有文献:针对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针对城乡分类要

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交换关系现状及特征的研究;针对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方向与思路的研究。已有文献针对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问题的探究是有价值的,但仍存在值得改进的广阔空间。作为对经济实践的回应和对已有文献的改进,本书首先界定了城镇与农村、生产要素类型、要素交换关系等核心概念,进而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转型时期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强调了经济发展战略、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联方式。从静态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着这样的依次决定关系:发展战略选择影响城乡要素交换关系,而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又影响经济发展绩效,此种变量的依次决定关系即为发展战略选择→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经济发展绩效(简称为 S→E→P 或 SEP)分析框架。从动态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绩效会对发展战略选择形成反馈机制,即发展中国家依据经济发展绩效来审视或评估发展战略选择,并基于此对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或修正,无论是长期的发展战略调整或短期的发展战略矫正都会导致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变动。相对于已有的发展经济理论,本书提出的 SEP 分析框架试图内生发展战略、制度安排、经济绩效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等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而该框架也就成为理解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阶段特征以及演变机制的理论依据。

立足于 SEP 分析框架,本书阐释了中国不同时期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基本特征及演变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展战略选择经历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经济增长主导战略和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依次转变,而不同时段的发展战略选择内生出相应的经济制度及政府行为,进而也就内生出相应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以及经济发展绩效,经济发展绩效进而又成为我国发展战略选择和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动态调整的驱动力量。经验上看,本书提出的 SEP 分析框架对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形成和演变机制是有解释力的。考虑到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集中表征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类要素的再配置,由此,本书分别研究了这三类要素城乡交换关系的基本特征、内在成因及经济效应。针对城乡劳动力要素交换关系,本书的研究表明:在发展战略转向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情形下,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仍面临着职业流转和身份转换的不同步,这意味

着劳动力市场因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而具有“割裂”或“扭曲”特征,这种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户籍制度等城乡制度安排紧密相关,而劳动力市场扭曲通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而对城乡消费差距收敛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针对城乡资本要素交换关系,本书的分析显示:在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资本逐利性增强的情形下,农村极为短缺的资金依托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出现了向城镇的净流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净流出的规模在整体上是渐趋增大的。导致上述资本流动的基本动因是城镇资本边际收益率超过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而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相对较低却与城乡金融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等因素紧密相关。针对城乡土地要素交换关系,本书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内部的土地配置方式有所变化,城乡之间则出现了农村土地单向度转为城镇用地的格局。整体上看,我国的城乡土地要素交换关系伴随着如下两大失衡: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区面积扩大速度超过了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城镇部门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份额超过了农村部门的获取程度。导致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土地制度的独特安排、经济增长主导的行政激励方式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压力。上述细分要素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增长主导战略逐渐转型为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由于与发展战略转变相关联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变革迟缓,遂导致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仍存在着不完善、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特征。

现阶段中国需要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以促进二元结构转化,进而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型动力机制。美国和日本的国际经验也显示: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作为主线的农业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城乡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过程。基于本书提出的 SEP 分析框架及其衍生的政府—市场互动方式,我国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面临着区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为此就须充分利用发展战略转变、经济总量增长等有利条件,主要针对转型期的经济制度和政府行为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中国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应耦合市场导向基准、体制变革基准、制度互补基准、分类实施基准、逐步推进基准和便利操作基准,以使完善方案更具针对性、有效性和可行性。基于条件

分析和基准确立,可以逻辑一致地提出中国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基本思路,此思路可被概括为“12345”,“1”即一个目标:通过要素交换关系完善构建自发型、内驱型城乡统筹发展方式;“2”即两种机制: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政府的经济调控功能;“3”即三种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类要素;“4”即四种途径:产权主体明晰化、交易市场完备化、收益分配均等化、体制支持长效化;“5”即五个方面的制度完善: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支持制度。

依据 SEP 分析框架推演的完善思路,本书强调:现阶段中国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政策,就是指在实施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职能为基点,由中央政府制定并经地方政府实施的针对城乡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要素再配置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或相关法律文本)。这些政策是城乡户籍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支持制度的具体化,其最终目标是形成自发型、内驱型的城乡统筹发展方式,推动二元结构持续转化并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型动力源泉。这一政策界定不仅内含着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政策的战略、机制、内容和目标取向,而且也阐释了政策选择的对象和时空范围。依据这种政策选择的含义和范围,本书依次提出了城乡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交换关系的完善方案,并从经济制度形成以及政府行为改进的视角提出了配套措施。这些方案的最终落脚点是推动城乡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有效地体现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经济职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对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值得强调的是,本书是在综合考虑城乡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要素的基础上理解“市场”的,同时是在引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这种政府间作用的基础上理解“政府”的,即对政府和市场这两者的结构分析是准确把握政府—市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本书提出的完善思路和政策选择体现了对 SEP 分析框架的回应,体现了对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现状和成因的回应,体现了对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政策有效性、持续性和可行性等原则的回应。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意义	1
第一节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特征	2
第二节 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18
第三节 本书研究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问题的展开逻辑	21
第二章 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评述	25
第一节 针对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与二元结构转化关联性的研究	25
第二节 针对城乡分类因素交换关系现实特征的研究	30
第三节 针对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思路的研究	40
第四节 对已有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研究文献的评述	44
第三章 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基本概念与分析框架	49
第一节 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基本概念的厘清	49
第二节 城乡要素交换关系 SEP 分析框架的提出	58
第三节 SEP 框架中发展战略选择对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影响	62
第四节 SEP 框架中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	66
第五节 SEP 框架中经济发展绩效对发展战略选择的反馈作用	70
第四章 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演变轨迹及基本逻辑	74

第一节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	74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主导战略下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	85
第三节	统筹协调发展战略下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	96
第五章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特征及其经济效应	109
第一节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特征:基于农民工视角的考察 ..	110
第二节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主要假说	119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指标选择	125
第四节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	130
第六章	中国城乡资本配置以及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测算	142
第一节	城乡金融体系演变与城乡资本配置格局	143
第二节	中国城乡资本流动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测度方法	154
第三节	中国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再估算及引申含义	157
第七章	中国城乡土地要素配置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174
第一节	新阶段中国城乡土地要素再配置的基本特征	175
第二节	中国城乡土地二元制度的形成及其运行逻辑	186
第三节	政府间经济行为与城乡土地流转方式选择	195
第八章	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路径	207
第一节	农业生产率提高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理论分析	208
第二节	美国和日本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	213
第三节	农业生产率提高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中国实践	231
第九章	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条件、基准和思路	237
第一节	中国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支撑条件	238
第二节	中国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若干基准	246
第三节	中国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基本思路	252

第十章 新时期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政策选择 261

 第一节 完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政策:含义与范围 262

 第二节 城乡劳动力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政策选择 265

 第三节 城乡资本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政策选择 269

 第四节 城乡土地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政策选择 273

 第五节 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配套措施及未来展望 278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6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的意义

生产要素是人类开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基本要件，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质是要素组合方式改变、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而要素组合或配置方式变革也会引致不同群体经济收益格局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对内的市场化改革、对外的开放程度提高增强了不同部门的要素流动性，优化了不同领域的要素配置效率，并由此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中国甚至世界经济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这是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也开始步入增长速度下降、增长动力转换、结构调整加速的“新常态”。尤其是，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需直面的结构性、瓶颈性问题。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演变与城乡两大部门的要素交换关系紧密相关，促使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进而推动城乡二元结构持续转化，是中国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据此，探究中国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内在演变逻辑以及后续的完善方案，自然也就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

第一节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特征

城乡要素交换关系是嵌入在中国整体经济格局之中的,其改进或完善也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内在要求,理解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首先需要准确认识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事实:

第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在时序意义上当前经济增速开始步入持续下降的新格局。

1978 年中国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开启了改革开放战略的伟大历程,这一战略是我国发展史甚至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我国以市场化经济体制转轨以及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作为主要“引擎”,充分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经济持续增长的契机,充分发挥国内劳动力要素供给充裕以及成本低廉的优势,积极推进农业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贸易体制改革以及政府经济调控方式改革,这些体制变革引致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以及配置效率提高。体制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和要素成本红利相互叠加,最终导致中国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表 1.1 显示: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78—2014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3 650.20 亿元显著增至 636 462.71 亿元,即使考虑人口规模增长因素,则同期人均 GDP 也从 382 元持续增至 46 652 元,按照当期汇率折算,2014 年我国人均 GDP 已攀升至 7 596 美元。从增长速度来看,剔除价格因素(按照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之后,1978—2014 年我国 GDP 增长率的最低值是 3.839%(1990 年),最高值是 14.162%(2007 年),其余年份处于这两者之间,考察期内 GDP 的年均增长率是 9.792%。同期人均 GDP 增长率的最低值是 2.400%(1990 年),最高值是 13.600%(2007 年),其余年份处于这两者之间,考察期内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是 8.719%。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之后,2014 年我国 GDP 总量相对于 1978 年增长了 27.254 倍,而人均 GDP 相对于 1978 年则增长了 18.802 倍。上述数据显示:改

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特征事实。

表 1.1 1978—2014 年中国 GDP 以及人均 GDP 的增长情况

年份	GDP (10 亿元)	人均 GDP (元)	GDP 指数 (上年=100)	人均 GDP 指数 (上年=100)	GDP 指数 (1978 年=100)	人均 GDP 指数 (1978 年=100)
1978	365.020	382.000	111.670	110.200	100.000	100.000
1979	406.770	420.000	107.573	106.100	107.600	106.100
1980	455.160	464.000	107.841	106.500	116.000	113.000
1981	489.810	493.000	105.243	103.800	122.000	117.300
1982	533.300	529.000	109.057	107.400	133.000	126.100
1983	597.560	584.000	110.853	109.200	147.300	137.600
1984	722.630	697.000	115.176	113.700	169.700	156.500
1985	903.990	860.000	113.466	112.000	192.700	175.300
1986	1 030.880	966.000	108.846	107.300	209.900	188.100
1987	1 210.220	1 116.000	111.583	109.900	234.500	206.800
1988	1 510.110	1 371.000	111.281	109.500	261.000	226.600
1989	1 709.030	1 528.000	104.063	102.600	272.000	232.500
1990	1 877.430	1 654.000	103.839	102.400	282.700	238.100
1991	2 189.550	1 903.000	109.179	107.800	308.900	256.700
1992	2 706.830	2 324.000	114.300	112.900	353.000	289.700
1993	3 552.430	3 015.000	113.900	112.600	402.200	326.300
1994	4 845.960	4 066.000	113.081	111.800	454.800	364.900
1995	6 112.980	5 074.000	111.000	109.800	504.800	400.600
1996	7 157.230	5 878.000	109.900	108.800	554.900	435.800
1997	7 942.950	6 457.000	109.200	108.100	606.100	471.100
1998	8 488.370	6 835.000	107.833	106.800	653.700	503.300
1999	9 018.770	7 199.000	107.620	106.700	703.500	536.900
2000	9 977.630	7 902.000	108.431	107.600	762.800	577.600
2001	11 027.040	8 670.000	108.300	107.500	826.100	621.100
2002	12 100.200	9 450.000	109.082	108.400	901.200	673.000
2003	13 656.460	10 600.000	110.025	109.300	991.500	735.800
2004	16 071.440	12 400.000	110.085	109.400	1 091.400	805.200
2005	18 589.580	14 259.000	111.310	110.700	1 215.300	891.300
2006	21 765.660	16 602.000	112.677	112.100	1 369.500	998.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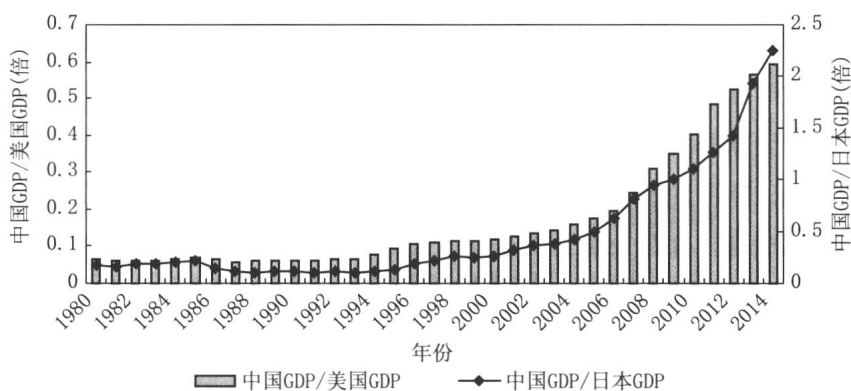
续表

年份	GDP (10 亿元)	人均 GDP (元)	GDP 指数 (上年=100)	人均 GDP 指数 (上年=100)	GDP 指数 (1978 年=100)	人均 GDP 指数 (1978 年=100)
2007	26 801.940	20 337.000	114.162	113.600	1 563.900	1 134.700
2008	31 675.170	23 912.000	109.635	109.100	1 714.400	1 237.500
2009	34 562.920	25 963.000	109.200	108.700	1 872.700	1 345.100
2010	40 890.300	30 567.000	110.600	110.100	2 071.800	1 480.900
2011	48 412.350	36 018.000	109.500	109.000	2 268.300	1 613.600
2012	53 412.304	39 544.000	107.748	107.200	2 444.100	1 730.200
2013	58 801.876	43 320.000	107.685	107.200	2 631.900	1 854.000
2014	63 646.271	46 652.000	107.351	106.800	2 825.400	1 980.200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基于改革开放战略取得的经济增长绩效,不仅在国内经济发展史上,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堪称“奇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1978—2014 年中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无论是从增长率的高度、高增长持续的时期以及高增长发生的人口规模来看,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甚至独特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 GDP 增长率的国际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在急速攀升,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演变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2000 年中国 GDP 为 1.205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总量的比重是 4.09%,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6 位。2014 年中国 GDP 为 10.360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总量的比重是 13.30%,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2 位。此外,如果对中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研究,则 1980 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呈现出追赶美国、超越日本的显著特征,且这种“赶超”态势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图 1.1 表明:中国 GDP 与美国 GDP 相比,1980 年前者仅为后者的 6.63%,2000 年该比值增至 11.72%,而 2014 年则快速攀升至 59.48%。中国 GDP 与日本 GDP 相比,1980 年前者仅为后者的 17.45%,2000 年提高至 25.48%,但 2009 年该比值变为 100.48%,2014 年更是攀高至

225.15%。2009 年之后,中国 GDP 已经超越日本而成为全球范围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国际经济格局、充分利用全球化红利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反过来说,在经济总量持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力随之提升,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经济力量的相对变化,导致中国在世界贸易、金融、产业发展以及政策协同等方面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走向的重要变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 1.1 1980—2014 年中国、美国和日本 GDP 的比较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显著提升了国内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状态和社会福祉,并显著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以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分界点,在未来的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总量年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的格局将发生重大转变,伴随着国内外格局的演变,我国 GDP 增长率将不可逆转地步入整体下移的新阶段。其原因在于:经济总量基数的不断增大,导致我国未来继续维持此前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不断增加;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尚处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深度调整阶段,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发生转变,这些转变很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增长在较长时期内趋于放缓;我国此前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比较优势——例如劳动力供给充裕和成本低

廉——也正在发生逆转,人口红利消减和刘易斯拐点到来导致我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整体上趋于减弱;更重要的是,英国、阿根廷、巴西、日本以及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繁荣(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2009)。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也隐含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例如,收入分配差距在波动中走高、经济增长与能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失衡加剧等等,这些结构性问题对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合意性和可行性带来了挑战。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步入持续下降的新阶段,现阶段我国既要看到经济增速下降是任何国家在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的普遍现象,至少经济基数的逐年增大会对增长速度产生“下拉”作用,与此同时,也要警惕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对我国经济社会,甚至全球经济格局带来的潜在冲击。中国当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基础性条件,促使经济增速平滑下移,且在未来长时期内保持次高速增长仍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此,我国必须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和国内要素禀赋的变动事实,深化体制改革以回应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依靠对结构性问题的矫正以及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来实现长时期的经济次高速增长。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在波动中渐趋消减,但城乡两部门的经济反差仍然显著且变动趋势尚不确定。

发展经济学指出: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着以农村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与以城镇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反差,这种反差的逐步缩减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如果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指标,那么 1978 年以来我国不同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波动态势。如表 1.2 所示:1978—2013 年我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呈现出提高趋势,但两者的相对关系却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按照当期价格测算,这种名义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如下变动历程:1978—1983 年从 2.570 倍持续降至 1.822 倍,1983—1994 年从 1.822 倍扩大至 2.863 倍,1994—1997 年则从 2.863 倍下降至 2.469 倍,1997—2009 年又从 2.469 倍扩大至 3.333 倍,2009—2013 年再